



# 改变

——问题形成和解决的原则

**CHANGE:**  
PRINCIPLES OF PROBLEM FORMATION  
AND PROBLEM RESOLUTION

[美] 保罗·瓦茨拉维克 约翰·威克兰德 理查德·菲什 / 著  
PAUL WATZLAWICK JOHN WEAKLAND RICHARD FISCH

夏林清 郑村棋 / 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合乎常理及遵从逻辑的思维方式，确实是一种解决之道；但有时中规中矩的做法反而导致失败，而那些看似不合逻辑和非理性的行动，却出乎意料地使问题得以改善。这种矛盾悖论的现象，正是本书所要探讨的主题。

本书三位作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精神病与行为科学系临床教授，帕洛阿尔托心理研究院精简治疗中心的创始人和研究人员，他们共同发展了当今心理治疗领域深具影响力的精简治疗理论和模式。本书作者根据自己长期的临床实践经验，深入探讨了人们面对难题时的“变”与“不变”的态度，以及问题是如何形成、为何会持续存在、如何又被突破解决的过程。他们依据群论和逻辑类型理论，提出了第二序改变的观点，强调解决问题本身，而非对问题的追本溯源。虽然书中引用的案例来自心理治疗，但其所提出的问题形成和解决的理念却适合人类互动的各种社会情境，甚至是国际关系的范畴。

本书充满辩证的思想精髓，激荡出令人惊喜的真理与创造性，一直是美国大学心理系及其他人文与社会学科师生的重要研读著作。



定价：18.00元

ISBN 978-7-5041-3986-3



9 787504 139863 >

责任编辑：周益群  
封面设计：dawa

# 改变 —— 问题形成和解决的原则

[美] 保罗·瓦茨拉维克 约翰·威克兰德 理查德·菲什 / 著  
PAUL WATZLAWICK JOHN WEAKLAND RICHARD FISCH

夏林清 郑村棋 / 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京 ·

责任编辑 周益群  
版式设计 贾艳凤  
责任校对 张 珍  
责任印制 曲凤玲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改变: 问题形成和解决的原则 / (美) 瓦茨拉维克,  
(美) 威克兰德, (美) 菲什著; 夏林清, 郑村棋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7. 11

书名原文: Change: principles of problem formation  
and problem resolution

ISBN 978 - 7 - 5041 - 3986 - 3

I. 改… II. ①瓦… ②威… ③菲… ④夏… ⑤郑…  
III. 问题解决 (心理学) IV. B8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8144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 - 2006 - 5853 号

---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邮 编 100101

传 真 010 - 64891796

市场部电话 010 - 64989009

编辑部电话 010 - 64989421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金奥都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1.25

字 数 139 千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译者序

# 变与不变 ——第二序改变的知识 起点

**初**读本书是在1983年我在哈佛开始博士课程时，那时它已经出版9年；全书初译完是1996年，2007年它在北京出版。是怎样的动能让我如此心系本书不愿放弃呢？如果你把我看成是30年来一路思索“变”的知识与投身于“变”之心理教育实践的工作者，同时也是一个对自己在私人与工作生活中变与不变之生活体验敏感的人，那么这本书对你而言也将会永远是变革知识的学习之钥！

然而，读者购买本书自有其动力与渴望，“变”有可能是自己企图解决某些问题的行动之一，那么如何读书也就反映了自己界定与解决问题方式的某些个人特性。有人可能一边读一边击掌大呼：这就是问题之所在！搞不好有人回家真的将床位挪到三面靠墙的方位，以期增加夫妻做爱的机会（第10章实例）；有人则精读“群论”，企图找到一以贯之的分析原则。正因为这本书谈的是“改变”，它很可能引发我们想要改变生活中某些问题

的企图，觉察到自己隐然被触动的动力来自何处，所以一边读《改变》，一边和自己的经验参照思索。但是，请不要企图在书中找到一帖可立即采用的药方，这是阅读本书的重要原则。

人们在回忆及整理与他人关系中的各种问题，挫折与痛苦的后果常记忆犹新，但问题的演变历程不是难以追寻，就是被错置重组得难以自圆其说。尝试去训练自己捕捉住某个互动的过程，回想关系脉络中发生了“什么”及“如何”发生，而不是事后自以为是地去解释“为什么”；带着书中“问题形成”的观点与自己的经验对话，这种平行移动的参照方式要比企图借着去分析因果掌握解决之道，会多一些反映思索的空间。

### 共振频道，时空不限

本书作者保罗·瓦茨拉维克（Paul Watzlawick）、约翰·威克兰德（John H. Weakland）和理查德·菲什（Richard Fisch）三人均成长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威克兰德已经去世，瓦茨拉维克与菲什现今也均已年过八十。1963年美国黑人权利运动大游行，1964年“越战”开始，1966年中国开始“文革”，1968年欧洲学生运动，正是在这种时代的脉冲中，三位作者一起投身治疗及研究工作，完成了本书。也正是这个背景，使得书中引用有关战争、间谍战、“文革”与婚姻家庭的实例，可以引领读者走出专业主义的划地自限。个人、人际、婚姻家庭与社会体制之间确实存在交相渗透的作用！

当1960年代世界各地纷扰翻动时，中国台湾地区正处于冷战“白色恐怖”<sup>①</sup>后的社会控制时代，在这个时代长大、当时正值大学四年级的我，专业方法的学习和社会政治意识的启蒙是两条并行线，这两条并行线均触及了《改变》中有关“变与不变”的知识，但它们在我身上的交会却直到20世纪80年代！

---

<sup>①</sup> 在蒋介石时代，中国台湾地区由1949年5月进入戒严，直至1987年才解除戒严。在中国台湾，“白色恐怖”指涉的是国民党政府在戒严期间因政治罪名所进行的镇压统治。“白色恐怖”的高峰期，特别是由1949—1953年，当时国民党政府在朝鲜战争发生与美援撑腰的背景下，大力清除其眼中的政治异己，估计在数年间有四五千人入狱。

1983年，我和郑村棋在全力投入工作七八年之后，终于有机会再进修，当时反复思索着人的改变问题。在此之前，我们接受团体动力与心理剧的思想与训练，在大学校园及社会教育领域中工作的同时，也关心着当时国民党外的政治运动（我们在1978年初结婚，次年发生美丽岛事件<sup>①</sup>）。对心理学领域中有关个人及团体改变知识的着迷，和我们所面对的台湾社会那种压制而找不到出路的苦闷气氛，相互交织成一股想寻找突破的动力。《改变》这本书在这个节骨眼上，为我们开启了一个经验反思与有方向性的知识寻求的历程；稍后我们对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了解及行动科学的涉入也是由这个起点开始。“什么是根本性的改变？什么是第一序改变、第二序改变？”这是我们两人在1983—1985年之间不断思辨的问题。

对我而言，在两年博士课程与家庭生活的双重压力下，彻底经验到自己许多无效却又不愿放弃的防卫策略。包括故意不在意女儿（当时才两岁半）进入托儿所的辛苦适应历程，而几近粗暴地将她“弃置”在托儿所；以及经验到自己在婚姻关系中如何陷入女性自怜自怨陷阱的同时，建构了由压制到爆发怨恨的逃逸路线。在这段日子的大大部分时间，我一方面似懂非懂地读着关于个体、组织与社会变革的知识，一方面却经验着在婚姻关系中重复发生、似乎无法改变的老把戏。这两方面在当时仍是同时存在，但却无法在认识上发生联系的两个世界。

《改变》这本书倒没有发挥什么“开悟”而问题就迎刃而解的神奇妙用，但它所指出的人类经验中有关“变”与“不变”间关系的知识的重要性，却给予了我痛苦中寻找方向与出路之行动的意义感。在我日后的实践中，这一种意义感，是我赖以透视个人、团体、组织与社会体制多层脉络的一个重要立足点与方向感。1986年我和郑村棋由哈佛回到台北，1987

---

<sup>①</sup> 美丽岛事件是指1978—1980年在台湾地区党外政治运动脉络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民主政治活动，包括“党外人士助选团”的成立（1978年），1978年12月16日蒋经国借“中美断交”而宣布停止选举，再发展到1979年12月暴力镇压美丽岛高雄游行，继之进行党外人士的大逮捕（详细数据可参看维基百科网址——<http://www.wikipedia.org>）。

年成立工作室（台湾劳工教育信息发展中心与工人立法行动委员会的前身），开始了台湾工人生活的调查与运动的实践。“变”的知识与方法就在1980年代前期，对我们发挥了知识理路厘清与转折找路的作用。

### 变革知识的理路

主流实证科学对基础知识与应用方法的主从分野，造就了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科技理性<sup>①</sup>和学术研究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不平等的劳动分工。它的后果便是，众多身处复杂人类与社会现场的工作者，在追寻知识与探究方法的过程中，陷入僵窄的胡同，久而久之，实践工作者失去了对生命细微变化辨识的能力，对场域脉络间交织牵动的力量亦视而不见。工作者这种失能状态与学科切割零碎化的问题在读《改变》的过程中是会有所突破的。

### 打开第三只眼睛

米尔顿·H. 埃里克森（Milton Erickson）在其序言中提醒“对想要了解团体行为许多方面的人来说，本书是必读的”道理何在？从“逻辑类型”的概念来说，个人、个人作为团体成员、团体作为一个整体（group as a whole）和数个团体所结构成的一个组织，都涉及了不同的系统层次。要探究团体的变化历程与组织的变革更新，必须得有对人际互动、团体动力、群体间关系及制度环境和人们行为之间相互影响的视野。读《改变》就打开了我们分辨“系统层次”与看见“功能作用”的眼睛。

我在1983年秋冬初读本书时，逻辑层次的概念当即使我回头梳理了年轻时（1976—1978）热切投入在青少年咨询工作后的混乱与疲劳。

---

① “科技理性”模式的基本观点是指专业知识存在于工具性的问题解决活动之中，科技知识则是现代社会专业化专业与专家的支撑。科技知识的专业化专业兴盛传播于20世纪的上半叶，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科技理性的专业化之事就开始遭受到各种质疑，《反映的实践者》（*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的作者唐纳德·A. 舍恩（Donald A. Schon）则在其书中进行了深刻的探讨，读者可参看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反映的实践者》一书。



以逻辑类型的概念来说，在担忧青少年变化而问题化青少年行为的辅导与咨询工作时，常企图以个人与人际层面的影响历程，来防堵式地解决社会问题。青少年犯罪与工厂青年问题都是20世纪70至80年代台湾地区特定发展状况中显现的特定现象（从20世纪80至90年代，外遇、离婚以及现在的网络援交也是被问题化的两个例子），这些现象被问题化的标签其实是社会管控的秩序调整的简化做法，专业的实践与反省力当然要破解这一点。

近年来在中国大陆迅速传播的心理疗法（例如，“催眠”法）也充斥着混淆了个人、人际与社会群体层次的经验，从而简化地错置了个体身上所承载的经验。在这一点上，本书可以发生重要的厘清作用，并引领我们循线思索第二序改变的知识与方法。

### 反映范式的转向

数学概念简单明白，人世纠结却难自拔；专业操演不难，志业实践却不易。《改变》中指出的“停止”无效旧行为与“重新框定”的新意被克里斯·阿吉里斯（Chris Argyris）与唐纳德·A. 舍恩（Donald A. Schon）承接住，并于20世纪80至90年代发展了行动科学、组织学习与反映实践的一脉知识！马克·吐温的顽童智慧（见本书第8章）即是舍恩称之为反映转向（the reflective turn）的范式革命的一个启发性示例，天天在复杂难解人类难题中忙碌不已的工作者，面对人们痛苦经验，尽力协助其更新发展的能耐也就是反映框定的功夫：

“反映的转向是一种革命，它开启了建构实践的认识论的问题……

反映的转向并不需要有统一的反映方法……我们不试图将一个人的观点化约为另一个……我们能够了解彼此、批判且改善彼此的工作，但我们仍走自己的路。”<sup>①</sup>

<sup>①</sup> Donald A. Schön 主编，夏林清译。反映回观。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3：17。

《改变》的再框定艺术原本就蕴涵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第二序改变的发展不来自执著地求变，而来自共享协同的开放态度。这一种共享协同的开放态度需要的不是一种掌控全局的全能者，而是知道探索的方法，能与人协同探索的人。

《改变》一书的冲击已于过去的30年带动、发展了变革知识与方法的典范转向！“协同探究者”与“反映实践者”已取代了专家的嘴脸。读者若对此理论知识有兴趣，可参考《反映的实践者》。回到与《改变》一书的关系，第二型组织学习理论所处理的主题正是《改变》中的一个重要发现。“为了掌握‘改变’的种种不可捉摸的特性，有一件事显得非常重要，就是必须区分事实以及关于事实的前提。”因此唯有明辨事实与前提，且能将此一明辨转化成行动力，“结束”一个无效的或折磨大家的人际行为的共构世界，才有可能找到一个“起点”！我说的“一个起点”也就是书中所指出的另一个道理：“‘结束’不是该游戏的一部分，也不是该群的一个成员。结束乃后设于该游戏，乃和游戏里的任何动作属于不同的逻辑类型。”

## 生命故事的转化

《改变》中的事例多来自于婚姻与家庭，而三位作者所参与贝特森所主持的研究工作，亦是20世纪60至70年代家庭治疗与悖论的发展根基，在台湾地区所引入的西方心理治疗知识与方法路径中，家庭治疗亦是最广为介绍的。

逻辑类型与系统层次的概念，对人生课题有着重要的贡献：个人生命因承受社会压制而被迫往内压扭或往外爆裂的表现状态，是否有机会（不论他意识与否）将不同体制层次的对待印记，还原地安置于不同逻辑层次的位置是一个发展的契机点！近年来“生命故事”的方法已开始流行，《改变》的许多小道理，在一些年轻人追寻生命自主发展的历程中，已被他们引用去梳理了，因层次未辨而纠结积淀于自身的各种记忆碎片或情绪包裹之中。我的桌上正放着一本这样的论文故事：

承认自己的怪异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这个世界令我难以忍受的一部分。

小学以前对于自己的记忆都很模糊，多数的照片有一种“忧郁”，但是我总觉得小学的自己似乎有一份单纯的幸福，国中以后，意识到自身的怪异并努力将它藏好，看起来正常甚至有点讨人喜欢的外貌，包裹着一个自己害怕并讨厌的怪异，有一部分的我是我不喜欢的，这算不算解离呢？

“就连指出人们对问题的否认，都会被视为坏人或疯子，更别说指出问题本身了。被视为坏人或疯子其实就是这种可怕的简化所造成的——除非那个人不但能够‘敏于视’，而且能够‘慎于言’。”（引自《改变》）

我矛盾吗？把两个世界分开才能不矛盾吧！或者，让生活绝对的失衡，表演出与精神病患者同样的勇气与决心，何尝不是一个值得喝彩的选择？其实，精神病患才不矛盾！在一个左右平衡的跷跷板上，向右向左都有可能，可是如果是活在一个绝对右倾的世界，不矛盾的选择在哪里？（刘于甄，辅仁大学心理系硕士论文，2005年）

几乎无所例外的，这些年来，我与实践工作者和学生们的教与学都发展成为一种伙伴关系，追寻个体与集体如何能在他所经历的重叠交缠的压迫生命中转化前行。“再框定”的转化是一种不可逆的新旧元素松动替换与交相作用的运作过程，个人在其中搏斗时，情感与认识的变化是一体两面的。与刘于甄一样，张瑞芸，一位29岁，有着一位在精神病疗养院中孤寂死亡父亲的小学老师，过去3年在拾回对“父亲”记忆碎片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穿梭来往于自己、父女、疾病污名、阶级压迫的叠影之中。以下是我摘录的两段瑞芸的话：

让不同的沉默对话

父亲让我画

他的左脸  
 画着的瞬间  
 我忘了去害怕  
 自己可能医不好他  
 或者  
 什么也没做  
 失去他  
 精神病人  
 他们说  
 要关起来  
 那是我爸爸啊  
 抱着3岁女儿买菜会杀价的人  
 在收容所的第9年  
 直视我说  
 “大家都可爱……要携手同心共进。”。(2004年秋)



我经常感觉到怒气与攻击，可是不明白所谓何来，处理小朋友的怒气我可以有点距离，我经常努力控制，让自己理性地处理学生与我或他们之间的冲突事件，可是不明白我的愤怒，我经常以为那是失控的疯狂，掩藏得小心翼翼，直到它攻击了谁。

可是我不知道这个阶层（指小学教师工作生活的阶层）的空气会让我周期性地活得像个死人，交替着感觉疯狂！向这个阶层证明自己的欲望，我现在知道可以回溯到父亲也试图在他工作的阶层（松山机场劳动社群）证明自己，只是他的证明方式和我不一样，男性位置让他不只要证明自己，还要证明一家人；从小到大的阶层和疯狂的被压迫经验早已体内成型，于是阶层常常混同了正常。只是这种向人证明的行动，恰恰限制了自己的生存联想。

回家看了户口簿、考核奖金、遗产继承、土地及房屋买卖权状，

抵押贷款证明。在我的国中毕业旅行纪念册下面有一本黑胶皮日志，封面的1985的金漆掉了色，里面有些地籍誊本，翻着内页到有字迹那一页，上面记录着各种资产、负债与结余，我认出那是爸爸的字迹，这是他的日记！1985年我10岁，就是他痛打我的那一年，那个我不敢穿短裤去上学的夏天。

我本以为那小心掩藏的怒气，是来自父亲的、母亲的，或者我们之间的。因为家庭内外结构被压迫经验而来的内化的怒气，被误以为是疯狂或者在母女关系里与人胡乱相认。（2005年春天）

在这里，明晰可见的、系统层次的辨识能力发生了经验重组的转化作用！

### 与变共舞，温柔相待

不同世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不同社会之文化生活面貌差异明显，但蕴涵在个人生命与群体生活，人们主动求变的动能与规律是可考察的！这种跨越时空的律动，召唤人们共振共舞，舞姿曲目各异其趣，但当新的突破形成出现后，呼应的变化必随之而来！变的规律与道理是需要仔细分辨与对待的能力。

《改变》可以带给你什么学习，我无法预知，但衷心地期望人人认真对待自己的生命经验，整个社会重蹈覆辙、制造混乱的机会就自然减少许多了！

夏林清

台北 辅仁大学心理系

2007年9月

## 序

对于本书，我原想说得更多，但身体的疾病使我无法如愿，不过却也引导我直接切入重点。

ix

坊间已有非常多谈论如何改变人的书籍和理论，好不容易才看到像作者以如此严谨的态度在审视“改变”这个主题本身的一本书，一本探究改变是如何自然发生，以及改变可以如何被推动的书。我在自己的工作中也力图了解与探究改变这一主题。心理治疗不只使我们明白已经无可改变的过去，更是为了改变令人不满的现状，亦即渴望过一个更好的未来生活。病人和治疗者都不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作多少的改变，但都知道，需要改变的是病人当前的处境。一旦有了改变的需求，不论它是多么微小，必然会促使其他的小改变发生；这些小小的改变发挥了滚雪球的效果，导致更有意义的改变。不管这些改变会消失、持续或转化为其他的改变，对了解人类的行为来说，它们都是重要的。我自己所做的工作则像是加速了个人及家庭中由细微渐次趋向于沸腾的改变——当事人所需要的是一种“非预期的”及“突发的”经验来带领他们进入实实在在的变化。

这本书关切的正是这种改变的现象。长期以



来，有关改变的种类和本质的理论一直被探究“如何改变人”的各种理论所忽略。保罗·瓦茨拉维克、约翰·威克兰德和理查德·菲什三人在这本极为重要的书中，审视了改变这一现象，并且将之放置于一个概念架构中，再辅助以许多不同的实例。他们的努力拓展了我们的视野：了解人们自己的问题是如何陷入与他人问题的相互纠结之中，以及加速解决人类僵局的方法。他们所提出的架构远远超越了原来的“心理”问题的领域，这一成就是迷人而值得喝彩的。我认为《改变》绝对是一本杰出的书，对想要了解团体行为许多方面的人来说，本书是必读的。

很高兴我自己的工作对本书呈现的观念有所贡献，也很庆幸有机会写这篇短文。也许，这样的小的动作正是需要“加速”去做的。

米尔顿·H. 埃里克森

美国亚利桑那州 菲尼克斯城

1973年11月

## 前 言

探索未知，固然勇敢；质疑已知，更需勇气。

——卡斯帕（Kaspar）

公元1334年，蒂罗尔（Tyrol）女公爵玛格丽塔·莫塔丝（Margareta Maultasch）将卡林西亚省（Carinthia）的霍赫奥斯特维茨（Hochosterwitz）城堡团团围住，因为她十分清楚：城堡位于一处十分险峻的岩石之上，足以抵挡一切直接的攻击；唯有进行长期围困，才能使之屈服。果然，一段时日之后，城堡守军的情况开始吃紧，因为粮食只剩下最后一头牛和两袋大麦。玛格丽塔这边的情况也同样愈趋急迫，不过却是因为别的缘故——部队开始变得不易控制，何时结束围城，又似乎遥遥无期，而她在别处还有其他军事要务呢！就在这个时候，城堡守将作了一个对守军而言，超乎寻常而愚蠢的决定。他命令士兵把最后的那头牛宰了，仅剩的大麦则塞进牛腹里，然后将牛尸抛下悬崖，落在敌人阵营前的草地上。女公爵收到这个轻蔑的讯息，一时气馁，立即撤除了包围，转往他处去了。

另一个极为不同的情况，发生在1940年5月的一艘英国拖网渔船上。这艘渔船正朝英吉利海峡多格海滩（Dogger Bank）的南方行驶，准备与德

国情报官里特少校 (Major Ritter) 秘密会面。船上有两名英国“双面间谍”<sup>①</sup>，代号分别为“白雪”和“饼干”。白雪曾为英国做过十分出色的情报工作，德国则视之为他们在英国的红牌特务。饼干曾经犯罪累累，后来成为警方可靠的线人，现在他即将以白雪副手的身份介绍给里特少校，在德国接受训练，再送回英国。基于某种原因，英国情报单位认为，白雪和饼干不应事先知道对方也在为英国工作，但希望他们后来都会逐渐猜测到这一事实，然而结果却变成了噩梦般的困局。马斯特曼 (J. C. Masterman) 在他所著的关于英国双面间谍系统的书中，有过精彩的描述：

在前往与里特少校会合的航途中，不幸的是，饼干观察白雪的言行之后，觉得白雪的行动其实有利于德国，一旦他们见到里特少校，一定会揭发他双面间谍的身份。另外，基于某些我们无法分析的原因，白雪也认为饼干其实是个德国间谍，也一定会在和里特少校见面时揭露他的暧昧身份。因此白雪就竭尽所能，试图使饼干相信他的所作所为，其实是有利于德国的，结果反而更加深了饼干原先对他的怀疑<sup>[75]</sup>。

在这一诡异的情境下，双方都尽力在做当时自己觉得最该做的事，但他们愈是努力，情况却愈糟糕。最后，为了自身的安全，也为了不使英国情报组织遭到惨败，饼干将白雪反锁在舱中，决定不与里特少校见面，掉头驶回英国的格里姆斯比 (Grimsby)。就这样，他小心翼翼防患失败的举动，反而造成了最终的失败。

这两个例子说明了本书的主题，即讨论人与事之“变”与“不变”这个老问题。更明确地说，这一主题所要探讨的是：问题如何产生，问题为何持续存在，问题又如何得以解决。其重点在于探究一种悖论的现象，即遵循常理与“合乎逻辑”的行为导致失败，而“不合逻辑”与“非理性”的行动（如霍赫奥斯特维茨城堡所采取的行动），反而使形势的变化

① “double cross” agent，此名词或指遭逮捕后“掉转矛头”（被迫为逮捕者工作）的敌方特务，或指自愿渗透到敌方间谍系统充当其特务的人。他们的任务为供应敌方似是而非的信息，协助侦捕其他敌方特务，等等。